

一、论积极稳健 的经济发展

要实现过得硬的发展速度*

(1994 年 7 月)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①同时又明确指出：“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②如何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思想，既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又要使发展速度过得硬，切实做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数量增长与素质提高的统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经济建设任务的关键。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在过去 30 年发展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提高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成就是巨大的。从 1979 年到 1991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 8.6%，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是否已经实现了过得硬的

* 本文原载《求是》1994 年第 14 期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5、377 页。
同上书，第 375、143 页。

速度呢？这就需要考察一下经济效益是否提高、经济结构是否协调的状况。

从工业的经济效益来看，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93 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确实比上年提高了。以“七五”时期年均为 100 综合指数由 1992 年的 89.5 提高到 96.6 提高了 7.1 个百分点。但是，1993 年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仍比“七五”时期平均水平低 3.4 个百分点而“七五”时期的经济效益低于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更显著低于国际水平。就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来看，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已成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投资总额增加过猛，基建规模过大导致建设周期延长效率降低。1993 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仅为 47.3% 比 1992 年的 65.6% 下降 18.3 个百分点。经济效益低下，是同产业结构不符合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源配置不合理分不开的。多年来，我国存在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能力不足与加工工业能力有余的矛盾。拿铁路来说，工业产值增长 1%，铁路货运能力需要增加 0.5%。1989—1990 年大体是 1:0.3，1991—1992 年大体是 1:0.2。1993 年更趋紧张有些限制口只能满足需求量的 60%。能源不足使不少工厂因缺电而每周“停二开五”，“停三开四”。由于能源发展滞后再加上许多加工工业一哄而起，盲目发展，超过市场容量，造成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和闲置。其中许多轻工和纺织企业闲置 30% 许多机械制造业闲置 25% 许多电子类消费品闲置 40—50%。这种产业存量结构的不合理不能不导致经济效益的降低。

从增量结构的状况看，1993 年有改善的一面。交通、邮电、通信方面的投资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上年的 14.7% 上升为 20.2%、这是令人鼓舞的。但另一方面，能源、原材料工业投资比重由上年的 58.9% 下降为 53.6%，使这些短线更短，而某些已经过长的加工工业仍在拉长。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小型化、分散化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发展。

此外，还有高消费的楼堂馆所、高级别墅、度假村、游乐场兴建过多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0.6% 加上消费基金的膨胀，使货币（现金）发行量比上年猛增 35.3%，广义货币 M_2 增长 24%，都大大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3.4% 的幅度。这不仅使 1993 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 13%，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24%，而且给 1994 年造成相当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今年第一季度全国零售物价上涨 20.1%。所有这些，都是不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

总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并且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产品和一批高效益的企业，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改善。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国国民经济还是速度效益型，而不是效益速度型；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而不是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国民经济的素质还是比较低的。这就是说，要实现过得硬的速度，还有很大差距，还需要付出坚韧不拔的巨大努力。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客观的认识。

邓小平同志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宏伟的发展战略。这是一个以优化结构、增进效益为基础的高速度战略部署。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谈到 90 年代的发展任务时指出：这 10 年中每个年度经济“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这样的速度，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上述要求实现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为基础的过得硬的发展速度，还是满足于低效益、高投入、片面追求产值的发展速度，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中央确定的唯一正确的前一种发展战略，我认为需要切实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转变思想、更新观念。

首先，切实地把片面追求产值的思想转变为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的思想。真正的财富是什么？马克思说过：“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①人们常说，要“把蛋糕做大些”，完全正确。但只有“蛋糕”中的乾物质才能提供营养成份，如果靠增加水分使“蛋糕”膨胀增大，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然是好事，但只有下苦功夫提高经济效益，并且提高人才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质量，才能真正地长远地造福于人民。如果只是争项目、铺摊子，不问盈亏，或者只求当前短期利益，吃“祖宗饭”和“子孙饭”，就可能事与愿违，贻祸人民。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工作真正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把这一方针称之为“新思路”。全党同志应当认真开拓“新思路”，坚决摒弃片面攀比产值速度甚至层层加码的形式的旧思路。至于最近在某些地方日趋严重的虚报生产成绩的腐败作风，更是绝对要不得的。

第二，切实地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思想转变为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思想。在经济发展中，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都是需要的，而且两者往往是结合进行的。在建设的初期，外延扩大再生产更值得重视。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必须及时地坚决地转变为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人力、场地、建筑和其他条件，把科学技术进步放在第一位，及时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比铺新摊子更快地取得更大的效益。正因为这样，国务院在1982年专门作出决定，明确规定实行“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辅”的方针。这个决定虽收到一些效果，但基本上没有贯彻落实。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占68%，技术改造投资占32%。在这不到投资总额1/3的技改投资中，还有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81页。

部分是“技改其名，基建其实”。我国国有企业在过去和现在都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但目前这些企业中，只有一部分生产经营情况较好，其余企业由于历史负担、社会负担过重和机制不活等原因，处于困难或萎缩状态，技术设备明显落后，而又无力改造更新。长此下去，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可喜的是，最近有些地方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多改造、少新建”“先改造、后新建”的正确原则。这一原则应该努力贯彻，认真落实。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坚决实行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方针，尽快焕发出国有企业强大的青春活力。

第三，切实地把依赖国家的思想转变为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发展的思想。一切经济工作者须要学会在市场大海中游泳的本领。市场竞争是产品质量、科技水平的竞争，也是成本、价格的竞争。市场是企业经济效益的严格检验者，也为企业增进经济效益提供强大的压力和动力。竞争的胜利者会得到丰厚的奖赏；失败者要受到无情的淘汰。一切企业和经济工作者不仅要面对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而且日益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目前，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合法地位的日期日益迫近。我们要积极做好准备，敢于同洋货争高低。只有千方百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经受住复关的冲击，锻炼出中华民族在经济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并不断地发展壮大。

第四，切实地把只求速度、忽视比例的思想转变为在比例协调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①。事实正是如此，每次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都出现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欲快反慢。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一方面是物质形态上第一、第二两大部类（大体表现为农、轻、重）和一、二、三次产业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

比例关系；一方面是价值形态上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只有比例关系恰当，国民经济才能有良性循环，才能有较高的速度和较好的总体效益。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零配件，就开不动。国际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经济进入高速度发展阶段，即所谓“起飞阶段”之前，必须有一个“助跑阶段”，通过这个阶段大体上理顺经济比例关系，特别是要打好农业和基础工业的底子，否则，高速度不能持久，到一定时候受瓶颈制约，只好慢下来，再去补课。我国每次经济发展过快，各方面挤来挤去，到头来是挤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从 80 年代初，就提出以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技为发展战略重点，十几年来这些方面在绝对量上都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仍然是薄弱环节，今后必须加强宏观调控，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大力加强这些薄弱环节。积累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每年都必须有大规模的投资，但投资的结构必须合乎客观比例的要求，投资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指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资金、材料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指出：“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①国内外的实践一再证明：投资规模在合理限度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和健康的发展；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就会发生相反的作用。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要在相当时期内占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段时间内是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必然引起供求失衡，通货膨胀。我国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都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引起的。我们在这方面缴纳的“学费”已经够多了。

要实现过得硬的速度，不仅要很好地解决战略思想问题，还

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保证发展战略的实现。要按照党的十四大决议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蓝图，全面推进，重点突破。要着重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使这些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解除它们的各种“包袱”，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内涵型、集约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处于领先地位。要努力加快投资体制的改革，实行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制，从经济机制上防止投资规模的过分扩张，促进投资效益的提高。要建立强有力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以保证社会供求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有计划地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树立科学的经济发展观，切实提高劳动生产率^{*}

（1993 年 8 月）

一、什么是经济发展？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经济发展与经济长当作同义语来使用。从科学用语来讲，这是两个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它是经济规模和水平的量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量的方面，又包括经济质的方面。这质的方面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是高还是低，生产经营方式是粗放的还是集约的，运行机制是良性的还是非良性的。只有量和质的共同提高，才是经济发展的完整的概念。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两个概念作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学院式的概念游戏，而是从长期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科学认识。经济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是不行的，特别是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速度必须快一些才能赶上发达国

^{*} 本文是作者 1993 年 3 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讲习班上讲演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改革开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排在本书《论积极稳健的改革》部分。文中 1992 年数字引自 1993 年初的《统计公报》

家。但如果认为增长速度越高越好，片面追求产值（或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结构失调等等问题，结果出现大起大落，反而影响了长期的速度，想要快反而慢。我们必须既注意量的增长，又注意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战略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经济发展应当是速度、结构、效益的统一，是当前速度与长期速度的统一，是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是主观要求与客观可能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包括投入活劳动和过去劳动的节约），则经济发展既有了量又有了质。

在 90 年代，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在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平均每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8%—9% 的速度。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不是过高的速度）。实现了这样的要求，就可以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长期来粗放型生产经营的条件下，不少人形成片面追求产值增长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转变的形势下，必须更新观念，“换脑筋”，完整地科学地理解经济发展的概念。从较长时期来看，一个企业如果只追求产值增长，而不顾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素质，它在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一个国家如果只顾短期内产值的较快增长，而不认真解决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不在提高效益上下功夫，必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最终遭受失败。只有切实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地胜利前进。

下面，围绕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从速度、结构、效益三个方面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作一些分析和讨论。

二、增长速度问题

199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2.8%，这在各国历史上是少有的高速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材料，1992年世界平均增长率只有 1.1%。这里包括三类情况：一类是发达国家，在连续三年经济萧条之后，复苏乏力，平均增长 1.7%（美国 1.8%，德国西部 1.5%，英国 -0.9%，法国 0，意大利 1.2%）；一类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增长率为 -14.65%（其中俄罗斯 -17.5%，匈牙利 -2%，波兰 -3%，捷克斯洛伐克 -5%，南斯拉夫 -50%）；还有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 6.1%，其中以亚太地区情况较好（马来西亚 8.4%，泰国 7.2%，印尼 5.5%，新加坡 3.6%，印度 3.6%，斯里兰卡 3.5%，中国台湾省 6.1%，香港 6.5%）。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年我国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的成果。

1993年3月举行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面分析了我国国内的条件和国际的有利环境，通过了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在上年度增长 12.8%的基础上增长 8%，其中工业增长 14%，农业增长 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0%以内。应当说，这仍然是一个高速度增长的计划，是一个由超常高速度转变为正常高速度的计划。今后按照每年 8%—9%的增长速度，到 1997年即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比原定的 2000年提前三年。

1993年国民经济计划在上半年实际执行的情况怎样呢？请看表 I。

从表 I 中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比较，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计划指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 5.9个百分点，工业超过了 11.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 31个百分点（尽管这些统计数字有些“水份”，但

可以反映出总的趋势)。不仅超过了当年计划指标,而且超过了高速发展的 1992 年。今年上半年的高速度发展中,一方面包含了各方面生产建设取得的新成就(其中夏粮在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之后又创高产新记录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客观实际的承受能力,加上其他种种因素,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表 I 1993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

	1992 年 实际增长	1993 年 计划增长	1993 年上半年 实际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	12. 8	8	13. 9
工业增长 %	20. 8	14	25. 1
农业增长 %	3. 7	4	4. 3 (夏粮数)
第三产业增长 %	9. 2	9 或 9 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	37. 6	30 以内	61
零售物价指数增长	5. 4	6 左右	10. 5
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增长	6. 4		12. 5

这些问题主要是: 投资规模过大, 国有单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新开工项目达 22 161 个, 在建总规模达 14 934 亿元, 成为带动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金融秩序混乱, 通过乱拆借、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 乱减免税收, 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炒房地产、炒股票、炒期货, 一度成风, 从而挤占了生产资金和重点建设资金, 出现了工厂流动资金短缺、“三角债”再度严重化、农产品收购“打白条”、重点项目基建资金不到位等情况。从表面上看, 银行和信用社贷款额度“控制较好”, 但由于资金“体外循环”的发展, 货币发行打破了上半年回笼的常规, 一变而为大量投放。财政收入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同期增长 3. 5%, 远

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 13.9% 而支出增长 12.5% 国家财政形势相当严峻。“瓶颈”约束更加突出。交通运输不畅，一些干线发生“梗阻”，能源供应不足，投资品（建筑材料等）紧缺，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这些问题的集中表现是通货膨胀已达到中度水平，并且在继续上涨。这除了受价格改革效应的影响（如放开粮价）之外，主要是受投资增长过快的影响，后来又加上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过快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几次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型”。这次则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由此而波及到各方面的涨价。上半年，建筑材料、能源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32% 全国零售物价上涨 10.5%，全国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消费品零售价加服务费用价）上涨 12.5%，其中 35 个大中城市上涨 17.4%。这样的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年度计划中关于零售物价指数上涨 6% 左右的要求。由于物价大幅度上涨，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影响了居民特别是低收入户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也影响了外商对我国经济稳定的信心。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许多人思想认识上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概念缺乏完整的科学的理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机制的原因。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投资增长过快。是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造成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旧体制下投资主体基本上是政府，是不承担风险的，而这次投资过热，基本上仍然是政府行为。但这种说法也不全面，因为在旧体制下，除了特殊情况（如“大跃进”时期）之外，投资的审批权是相当集中的，因而可以用行政办法来控制，而现在审批权过多地“层层下放”，下级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当然，我决不是说要退回到旧体制的行政办法，而是说客观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尽快建立起投资主体的风险机制和约束机制。既然权力层层下放，投资者而又不承担风险，那么，自然会形成摊子铺得越大越好，投资越多越好。自

己没有钱，就向银行贷款，贷款贷不到，就乱拆借、乱搞高利集资。除了投资主体没有建立风险机制之外，宏观调控的滞后和无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家的投资银行没有建立起承担风险的机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重点投资力量的比重越来越小，不少地方为吸引外国和外地投资，竞相减免国家税收。这样，宏观调控的两个主要手段——财政和金融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再加上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片面认识，把国家计划的作用完全置之脑后，无怪乎出现上面表 1 中所显示的那样全国人大通过的计划数字与实际执行数字大相径庭的现象了。总之，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的不深入、不配套，以及因此造成的新旧体制双轨运行中的脱节和混乱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上述问题，已经对症下药地采取了措施。主要是：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严肃金融和财经纪律，纠正金融、财政、税收方面的种种混乱现象，强化宏观管理。国务院提出金融系统要“约法三章”限期清理违章拆借，不准搞“储蓄大战”；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财税部门也要“约法三章”：严格控制税收减免；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向人民银行挂账；财税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搞涉及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中央和国务院还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 16 条措施，力求更多地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结合必要的行政手段整顿秩序，深化改革。具体内容这里就不详谈了。

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已经收到了初步成效。例如：居民储蓄存款显著回升，外汇市场的汇率趋于合理（人民币与美元之比由 1:11 回升为 1:8.8），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开始降温，新开工的建设项目开始减少，建筑用钢材等投资品价格开始回落，等等。当然，这只是一个好的开端。各项治标的措施尚需全面贯彻，不能放松。至于治本的措施——深化改革，建立企业投资风险机制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从而消除片面追求产值高速度的根源，

还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次加强宏观调控，主要是整顿经济秩序，调整经济结构，而不是“全面紧缩”“急刹车”。实际上是要把脱离国情国力的超常高速度调整到合乎国情国力的正常高速度，防止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有关部门的经济监测，今年六、七月经济运行的“同步指标”（如工业总产值、基建投资完成额、货币供应量 M1 等）尚在“红灯区”运行（一般经济监测分为红灯区、黄灯区、绿灯区、浅黄灯区、蓝灯区）；同时在各种制约因素和国家调控下，“先行指标”即“预警指标”（如储蓄存款、钢材库存等）则开始缓解，这预示着今年四季度经济有可能走出“红灯区”回落到“黄灯区”。从全年经济增长速度看，仍将超过 10%，有可能接近于 1992 年的增长速度。预计 1993 年我国仍将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三、经济结构问题

经济结构涉及面很广。这里只谈两个突出的、关键性的问题：农业问题，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问题。

1. 农业问题。

关于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关文件和报纸上谈得很多了。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第二、第三产业相比较，农业（第一产业）是一个竞争中的弱者。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我国的农业问题。为什么说它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呢？这是因为：

——农业离不开土地，土地的有限性，绝对地租的存在，给农业带来不利条件；

——农业是靠生物机能增殖财富的，生物机能离不开自然条件、气候的多变性，自然灾害的频繁性，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困难；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二元结构，农村的经济水平以及与之

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水平都低于城市；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口增长率比城市高出一倍，而耕地面积相对狭小，大批剩余劳动力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前两条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后两条是我国特有的。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也要对农业给予相当大量的财政补贴，实行价格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中，对工业是不允许政府补贴的（如有发现，对方就在按“反倾销法”限制进口）；而对农业的补贴，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一般是允许的（当然各国家之间也有矛盾）。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大量剥削农民，支持工业发展；到工业化实现之后，又以现代化的、高效益的工业支持农业，使农业实现现代化，并由国家财政收入（包括工业上交的税款）给予农业以补贴和保护。那种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可以放任不管的想法，既不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更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国农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目前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农产品收购“打白条”和农民负担过重，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在抓，并取得了成效，但尚未彻底解决。

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与片面追求超常高速度分不开的。为了高速度，基建投资加上房地产热，占去了大部分资金，给国家留下“硬缺口”，收购部门没有钱，只好“打白条”。为了追求高速度，各个部门搞了许多“达标”活动，要求短期内出“政绩”，但钱又没有来源，只有对农民增加摊派。近年来的“打白条”和农民负担过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过去“大跃进”中“一平二调三扣款”和各种“大办”的重演，不过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实际追求的是工业的高速度，必然要挤农业、挤农民，这可能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这说明，恰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保持工农业比例的协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